

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

——教育学学习资料(一)

上海市师范学校教材编写组编

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

——教育学学习资料（一）

上海市师范学校教材编写组编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毛主席语录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前 言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为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必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总结教育史上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肯定法家教育思想的进步作用，彻底地批判儒家反动的教育思想，并肃清其流毒，乃是当前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帮助师范学校学员进一步研究历史上法家的进步教育思想，彻底批判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精神支柱的儒家教育思想，并适应各校教育学教学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份学习资料。

这份资料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历史上各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的进步的教育思想；第二部份，除选了批判儒家反动教育思想的祖师爷——孔丘的教育思想的文章外，还编入了一些批判浸透孔孟之道毒汁的宣扬儒家反动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三字经》、《神童诗》之类东西的文章。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在编选工作中一定会存在很多缺点和错误，因此我们恳切地希望各师范学校的学员、教师及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上海市师范学校教材编写组教育学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一部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家教育思想

论先秦法家进步的教育思想

.....广西民族学院批判组 (1)

两汉时期儒法教育思想的斗争

.....广东师院教育学教研室写作组 (9)

商鞅在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石达 (15)

荀子的法家教育思想

——读《劝学》篇札记

.....沈达 閻发 (25)

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服务的韩非教育思想

.....石达 (34)

反孔战士王充的教育思想.....焦明 (42)

谈王安石对教育的改革.....秦华 (46)

李贽的进步教育思想.....庆思 (55)

附：法家教育思想言论摘录

.....上海师大教育系资料室 (63)

第二部份：批判儒家反动教育思想

孔丘教育思想与“克己复礼”.....唐晓文 (83)

《三字经》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教材.....湯啸 (93)

狠批“今不如昔”，虚心向小将学习.....管惟英 (102)

狠批“教之道，贵以专”.....陈开慧 (105)

批判《神童诗》宣扬的儒家反动教育思想

.....秦华 (108)

《弟子规》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书

.....湘青 史卫东 (116)

批判孔孟之道反动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学记》

.....罗程平 (123)

评韩愈的《师说》.....广东师院中文系二年级
第三教学班 大批判组 (127)

附：资料之一 《三字经》的出笼和流传简况

.....翟闻 (131)

资料之二 《神童诗》及其泛滥简况.....肖黎 (134)

论先秦法家进步的教育思想

广西民族学院批判组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没落崩溃，新兴封建制度兴起和确立的大变革时代。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人物，为建立、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们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重视教育的改革，使教育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服务。他们是当时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也是当时杰出的教育改革家。

(一)

一定的教育思想，总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孔儒学派为了维护和复辟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竭力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他们宣扬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孔丘认为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孟轲则宣扬“良知”“良能”，“先知”“先觉”。他们宣扬这一套谬论，是为复辟奴隶主贵族统治制造理论根据。因之，他们的教育思想体系，也建立在这种反动的唯心论先验论的基础上。既然知识是先天的，那么，当然应由那些“先知”“先觉”“生而知之”的“圣人”来掌握教育大权，来统治学校。孟轲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儒家的教育路线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要让奴隶主贵族及其“圣人”垄断教育。对劳动人

民来说，就是要实行愚民教育。这正象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这就是儒家教育路线的反动实质之所在。

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坚持朴素的唯物论的认识论，使教育思想建立在进步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他们对儒家唯心论的先验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人的知识是后天才有的，根本不存在先天的知识，不存在先于实践的知识。韩非指出：“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韩非子·解老》）那些先于实践、先于事物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前识”，是毫无根据的胡猜乱想，主观臆测。荀子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人是有认识能力的，而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这样，只要通过教育就可以掌握知识，这就为当时的教育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法家还认为，所谓“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学习积累而成。荀子说：“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所谓“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问题在于教育和积累。法家还进一步指出：所谓君子、圣人，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比普通人强：“相高下，视埳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荀子·儒效》）这就完全否定了孔丘鼓吹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谬论，有力地批判了所谓“圣人”是天生的反动说教。

先秦法家对儒家宣扬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所进行的批判，打中了儒家反动教育路线的要害，摧毁了儒家反动教育路线的基础，表现出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法家的革新进取精神。

在朴素的唯物论的基础上，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还强调了

学习的实践观点。认为学习的最好途径，是通过实践，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实践。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荀子把学习的途径，分成闻、见、知、行四种，而把行（实践）看作是学习最好的途径。这一观点，反对了儒家所谓“内省”的闭门修养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韩非还提出“参验”的观点，认为一切知识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把不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作为依据，那是很愚蠢的，（“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韩非子·显学》）。当然，他们强调的实践，只是个人的实践，而不是社会的实践。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当时能够对实践的观点，作出重要的论述，这对古代教育思想来说也是很可贵的。

（二）

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视教育的影响，重视发挥教育的作用，把教育提到了重要的地位来认识。

先秦法家对于教育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是和他们要通过教育，提高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政治目的连在一起的。儒家在“克己复礼”的黑旗下，竭力鼓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谬论，取消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企图使人民处于愚昧的状态，便于奴隶主贵族对他们的统治。法家为了打破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强调使新兴的地主阶级通过教育获得政治地位。荀子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儒效》）所以法家提出要“教民”“涂之人——百姓”都可以受教育，使

新兴地主阶级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地位，由老百姓上升为士、君子、圣人，以取代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这在新兴地主阶级要夺取政权的时候，是进步的，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法家还认为通过教育，可以达到改造人的目的。荀子认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指出了社会上的风俗习惯，各个国家不同，都是由于教育的结果。但是这种种不同的习性，又是可以通过教育加以改造的。就是荀子所讲的“化性”论。荀子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意思是说，人的性、情都是别人所不能够做到的，但是可以改造。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经过不断教育，也可以成为“圣人”。荀子曾经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明这个问题：“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揉使之然也。”（《荀子·劝学》）木工用黑线来取直木材，把木弯曲做成车轮，它的曲度合乎圆规所画的圆，虽然经过干枯日晒，但不会再直了，这是用人力把它弯曲，使它成为这个样子的。荀子用这个形象的比喻说明教育的改造作用。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第一次明确地论述了教育的社会改造作用。这就把教育从儒家的天才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上改造人的工具。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

先秦法家代表人物还认为，教育是人们积累知识，由愚变智的途径。他们对于“积”的作用作了很好的论述。认为：“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说明了人的知识不是天性，而是后天学习积累而来的。所以通过教育、学

习，可以使人由愚变智。这一理论，强调了教育对于人们知识积累的作用，对儒家“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观点，是一个深刻的批判。

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先秦法家只是朴素的唯物论者，他们还缺乏辩证观点，特别是荀子在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时，往往包含有“教育万能”的倾向。但是先秦法家强调了教育的社会作用，重视发挥教育的作用，这对儒家教育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于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是一个贡献。

(三)

教育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先秦法家，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教育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法治”的政治路线服务。

儒家反动的“克己复礼”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法先王”，把“诗”“书”“礼”“乐”等作为教育的内容。针对儒家教育复古、倒退的路线，法家提出了自己反复古的教育路线。商鞅指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君书·农战》）他把儒家这一套教育内容，看成是使国家贫弱的祸根。他提出“燔（音烦fán，烧的意思）诗书而明法令”，要烧掉儒家的诗书，使法令能够实行。他还认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这些都是针对儒家反动的复古倒退的教育路线，而发出的抨击。荀子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所谓“法先王”的路线，是“呼先

王以欺愚者”（《荀子·儒效》），打着先王的旗号来欺骗老百姓罢了。

到了韩非，总结了法家先驱人物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儒家反动的教育路线，给予更为彻底的批判，提出了更加完备的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的教育纲领。韩非指出：什么都以先王作为根据，以尧舜的一切作为标准，不是愚蠢就是欺骗。他大声疾呼“废先王之教”。韩非看出了儒家通过教育来破坏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革新运动的阴谋。他深刻指出：所以乱国的风俗，就是那些儒生们讲什么先王之道，假借什么仁义，乔装打扮来粉饰他们的花言巧语，用来惑乱当时的法治，动摇君主改革的决心（《韩非子·五蠹》）。法家代表人物的这些论述，对于儒家“以文乱法”复古倒退的教育路线，是非常深刻的批判与揭露。在揭露、批判了儒家反动的教育路线的基础上，法家提出了“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纲领。这个纲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上的要求，为新兴地主阶级革新的政治路线服务。他们坚决主张取缔儒家经典书简，把法作为教育的内容。禁止宣扬先王之道的儒生做教师，而以执行法令的官吏为教师。这就确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法家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权威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新兴地主阶级专政。

教育路线的中心问题，是为哪一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法家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对儒家的教育路线进行了批判。先秦法家指出：儒家所培养出来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生，是一批寄生虫。韩非和商鞅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不事力而食”，“不战功而尊”的儒生们，是国家的“蠹虫”，应该通通把它们扫除干净。作为“法治”的政治改革路线的一个侧翼，法家非常强调农、战，认为农、战是富国强兵之道。所以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从有利于新兴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出

发，法家主张以法令作为教材，主张学习耕战，培养懂得法律，遵守法律，懂得耕田，懂得打仗的，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这种教育路线培养的人，对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是有利的，在历史上起着进步的作用。

在先秦法家政治革新路线下产生的法家教育革新路线，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路线服务，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之，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教育，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教育紧密地为他们的政治改革服务，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上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先秦法家代表人物中，荀子不仅写了象《劝学》那样完整的教育理论的著作；在实践中，他三到齐国的稷下讲学，三为祭酒；在教学中培养了象韩非、李斯这样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荀子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教育家。至于商鞅、韩非、李斯他们杰出的文化教育理论和实践，为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专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两千多年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和尊孔派的歪曲，把我国古代教育史写成了儒家独霸的教育史，法家则受到了种种诬蔑与攻击。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无耻地攻击什么“全面消灭教育和文化早就是法家纲领的基本要求之一。”这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样，都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胜利地不断深入发展。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教育革命蓬蓬勃勃地开展，形势一派大好。但要在教育战线上彻底清除孔孟之道，还有许多战斗需要我们去进行。为了把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深批透，我们必须运用

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法家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分析，给予必要的历史肯定。通过教育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给今天的运动以借鉴，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光明日报》1974年7月19日）

两汉时期儒法教育思想的斗争

广东师院教育学教研室写作组

西汉王朝的初期和中期，地主阶级当权派基本上采用了秦始皇所执行的法家政治路线，即所谓“汉承秦制”。因此，在汉元帝以前，在教育方面也基本上继承了法家的教育路线。到了西汉末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除了使用反革命暴力镇压农民革命外，还求助于孔老二的亡灵，企图借孔孟儒学麻痹革命人民，缓和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地主阶级保守派董仲舒的改造、神化了的儒家学说便逐渐抬头。从西汉元帝开始，尊儒反法，尊崇孔丘，重用儒生，大肆提倡儒家学说，在整个教育领域里孔孟之道占了统治地位。

但是，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西汉末年爆发了赤眉、铜马、绿林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农民革命的推动下，地主阶级中一些进步思想家也要求变革，在东汉初期便出现了法家思想家王充。王充面对思想教育领域里掀起的为世家豪族地主服务的独尊儒术的逆流，不怕讥笑，不怕迫害，举起反儒尊法的战斗旗帜，对孔丘和儒学特别是被封建统治者和董仲舒神化了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激烈的斗争。

这个时期思想教育领域里的儒法斗争是围绕着下面几个问题进行的：

（一）独尊儒术与“伐孔”反儒的斗争

汉武帝时，地主阶级的保守派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对此并没有真正采纳，而是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及至元帝上台后，“独尊儒术”被确定为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孔丘的地位越来越高。汉元帝封孔丘十三世孙为侯，并“以其食邑八百户”祭祀孔丘。汉平帝更进一步直接追封孔丘为“褒成宣尼公”。于是，学校立儒学为“正宗”，而诸子百家特别法家思想被斥为“邪说”“异端”。太学里，不仅设“五经博士”，“六经博士”等专讲“孔子之术”，“六艺之文”，而且汉明帝“亲于辟雍（封建社会的一种贵族大学）自讲所制五经章句”。章帝更亲自主持白虎观的经书讨论会，编订以讖緯迷信为根据的《白虎通义》一书，并要求“永远为后世之法则”。这样，与神学迷信合流的孔学便成为学校最主要的教材。

面对这股尊孔逆流，王充以无所畏惧的反潮流精神，举起“伐孔”“刺孟”的大旗，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指出孔老二根本不是什么代天立道的“圣人”，而是“言行相违”“废礼伤法”“贪官好仕”的伪君子。是个“言无定趋”，“行无常务”，到处混饭吃的极端庸俗的人。他义正词严地提出：“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还指出当时被独尊的儒学，多是“虚妄之语”。他痛斥当时远离现实生活，专写祥瑞灾异，神仙鬼怪，宣扬帝王圣贤皆“禀精于天”的讖緯正宗是“奸书伪文”。王充这些大胆讨伐孔老二的言论，把当时讖緯正宗所神化了的孔子，封建帝王树立起来的神圣偶像，从天空打落到人间，这不仅对讖緯迷信家进行了猛烈的鞭答，更是对东汉王朝在教育领域利用孔丘麻痹人民的骗术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在教育上，王充针对“独尊儒术”的反动方针，高举反孔刺